



文化多样性与地方治理丛书·总主编 戴小明

明清移民与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杨洪林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014043909



文化多样性与地方治理丛书·总主编 戴小明

D691
123

明清移民与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杨洪林 著



北航

C1731276

D691
12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移民与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 杨洪林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 - 7 - 5161 - 3455 - 9

I. ①明… II. ①杨… III. ①少数民族—民族地区—移民—关系—
乡村—社会变迁—研究—湖北省—明清时代 IV. ①D691②K29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5245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孔继萍
责任校对 王雪梅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5
插 页 2
字 数 312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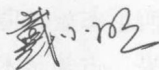
总 序

湖北民族学院地处鄂渝湘黔四省（市）毗邻的武陵山片区腹地——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长期以来，学校始终牢记“面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为少数民族、民族地区和国家战略服务”的办学宗旨，坚持“立足湖北、面向西部、服务基层、辐射全国”的办学定位。近年来，依托民族地区、武陵山区，哲学社会科学专业建设、学科发展充分发挥省级科研平台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的团队凝聚和辐射功能，以“大民族学”的视阈来开展科学研究、构建优势学科体系、凝炼特色学科方向，保持和加强在“一州”（恩施自治州）、“一区”（武陵山片区）、“一族”（土家族）研究领域的独特优势，努力在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安全、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鄂西生态旅游圈建设，以及民族区域治理等领域产生具有重大影响的理论成果，占领学术研究的高地。

在湖北省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的支持下，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这套《文化多样性与地方治理丛书》，是一个大型的跨学科协同研究项目，涉及文化学、历史学、民族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领域。该项目的目的不仅在于展示湖北民族学院及“2011计划”协同单位学者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更在于激励具有创新精神的年轻学者脱颖而出。丛书的研究内容既有对地方治理政策框架的宏观讨论，也有民族地方具体政策法规的微观分析，还有社会文化变迁的细致考察，从丛书的选题和研究内容来看，它们本身就带有文化多样性的特点。丛书的作者都是接受过系统专业学习和学术训练的博士，既有已经在学界崭露头角的中青年专家，也有初出茅庐的青年才俊，虽然有的著作可能还略显稚嫩，但都显示出了每一位研究者良好的创新能力和较为扎实的基本功底。

一方山水养育一方人，有什么样的风土，就有什么样的人文；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地方风貌。地方政府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了解前者，就不能了解后者。每一个国家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却有多个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更为息息相关，与多样性的地理和社会生态环境的联系更为密切。地方政府的重要性，不仅源于与它有关的政治和政治家们，源于在地方这一级所提供的服务的数量，而且还源于它在增进民主和个人自由方面所作的哲理和道德上的贡献。^① 现代治理是德治与法治的结合、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的统一，更是文化认同、文化共识之上的规则之治、宪政之治。多民族统一的中国疆域辽阔，地域差别，民族不同，文化多样，历史和现实昭示我们：政府施政不能脱离民族的文化传统，相应的人文环境，只有尊重传统性，包容多样性，关注民族性，才能因地制宜，实现有效治理，达致善治。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我们期待《文化多样性与地方治理丛书》的出版，能对推动地方治理、特别是民族区域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提升有所裨益。

值此《文化多样性与地方治理丛书》付梓之际，我们谨向所有对组编工作给予关注、支持和帮助的相关专家，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及其编辑者所付出的努力致以衷心的感谢！



2013年10月8日

^① 参见〔以〕柴姆·卡西姆《民主制中的以色列地方权力》，余斌、王荣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序 言

近十多年来,区域性移民研究一直是中国移民问题研究中的热点,围绕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成果丰富。这些成果的基本特点是在弄清区域性移民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将人口迁移与迁入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结合起来,由此也产生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然而针对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移民研究,却是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对少数民族移民尤其是外来少数民族迁入世居民族聚居区的现象和过程关注度不高;对历史移民对民族关系产生的影响评估不够充分;对移民的社会适应过程和社会文化变迁缺乏微观考察;等等。

有鉴于此,杨洪林博士的这本《明清移民与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研究》,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和探索,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中国移民史的理论研究,同时,对于今天中国社会现实中的各类移民问题,也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涵盖了今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所辖8个县市和宜昌市所辖的长阳、五峰2个土族自治县,正处于学界所称“武陵民族走廊”的东北缘,历史上就是中东部人口向西部和南方迁移的重要通道,也是“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的必经之地和重要目的地。自古以来,汉族、苗族、侗族、白族、蒙古族等各民族移民在不同历史时期迁入该区域。上述移民在交流与碰撞中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文化繁荣和社会发展。在历次移民大潮中,一些移民族群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特点传承下来,至今仍保留着对本民族的强烈认同。但是,也有为数不少的移民融入了该区域的世居民族——土家族之中。因此,研究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移民与乡村社会变迁,是认识、了解土家族历史文化的前提,是分析当地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和谐发展的必要途径。

全书围绕历史移民这条主线,站在“移民与社会变迁的交互作用”的宏观视角,以鄂西南民族地区历史移民与当地乡村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为个案和范本,对移民的规模、特征、功能和影响进行归纳式总结,将考察对象置于东西结合部民族聚居区社会背景下,系统探讨了移民族群与土著族群的相互关系,“窥斑见豹”地揭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格局形成的微观过程。同时,作者又牢牢把握住移民族群和土著族群各自的社会文化变迁这两大支线而展开了深入细致的论述,这两种变迁研究是本书进行移民原因和影响分析的基础。

写作过程中,作者运用了丰富的史料,结合田野调查取得的一手资料,较为系统地讨论了移民定居与社会融入、乡村社会变迁等重大问题,主要论点正确,依据的材料翔实,理论运用与提升较为妥当,显示出作者具有较为坚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和较强的科研能力。此外,全书在方法运用、材料收集、视角选择、理论总结等方面,都有诸多创新之处:

一是研究方法综合交叉。全书综合运用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文献梳理以及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明清移民和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特别是作者大量运用田野调查法研究移民史,深入乡村社会参与观察人们的日常生活,弥补了文献资料的不足,并为移民原因和影响评估引入新的分析视角。作者还坚持微观考察与宏观研究相结合,具体描述与理论抽象相统一,既引用了丰富翔实的文献资料,又不囿于文献窠臼,而能自觉上升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高度,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显示作者兼备较深的理论素养和较强的微观分析能力。

二是研究材料丰富多样。人口迁移的历史痕迹以及由此导致的文化变迁并不总能完整无遗地保存在历史文献资料中,有些却保留在代代相传的民间传说、故事等口碑材料中。作者通过田野工作收集了大量的家族谱牒、碑刻铭文、口述史实等,其中有些资料还未曾为其他学者所采用过,如对“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是否起源于元末明初的讨论;对张献忠屠蜀的辨正。同时,借助对这些新材料的分析,作者还发现,受移民文化影响,土著居民的居居方式、服饰穿戴、宗教信仰、岁时礼仪、饮食习俗等文化因子都发生了变迁,吸收了较多汉文化及部分苗、侗等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容,反过来,移民的传统文化也会受到土著文化的影响,从而产生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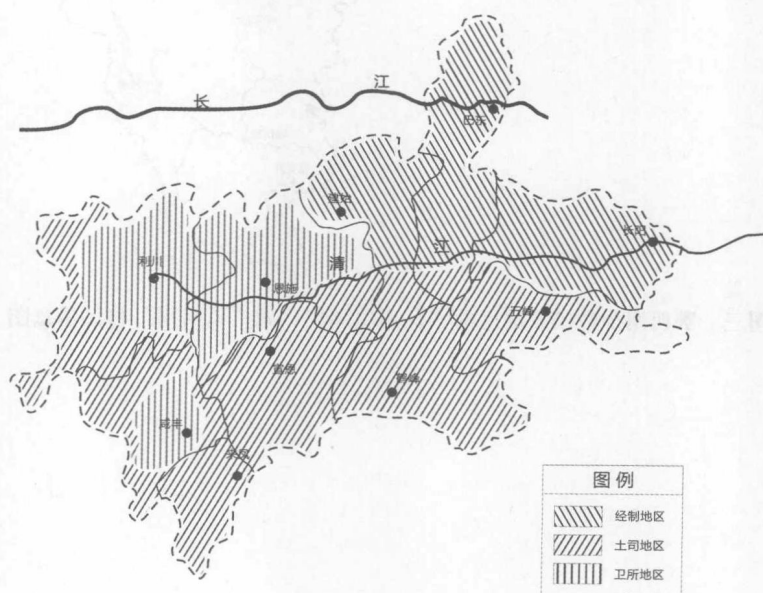
三是研究视角新颖独特。以往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移民研究，多将目光集中于汉族移民身上，而本书作者将少数民族移民也纳入研究范围，综合考察移民族群与土著族群的认同变化与社会变迁；以往的研究，多集中针对边疆地区的移民活动，而本书将研究视角转向内陆腹地，从而开辟了中国移民史研究的新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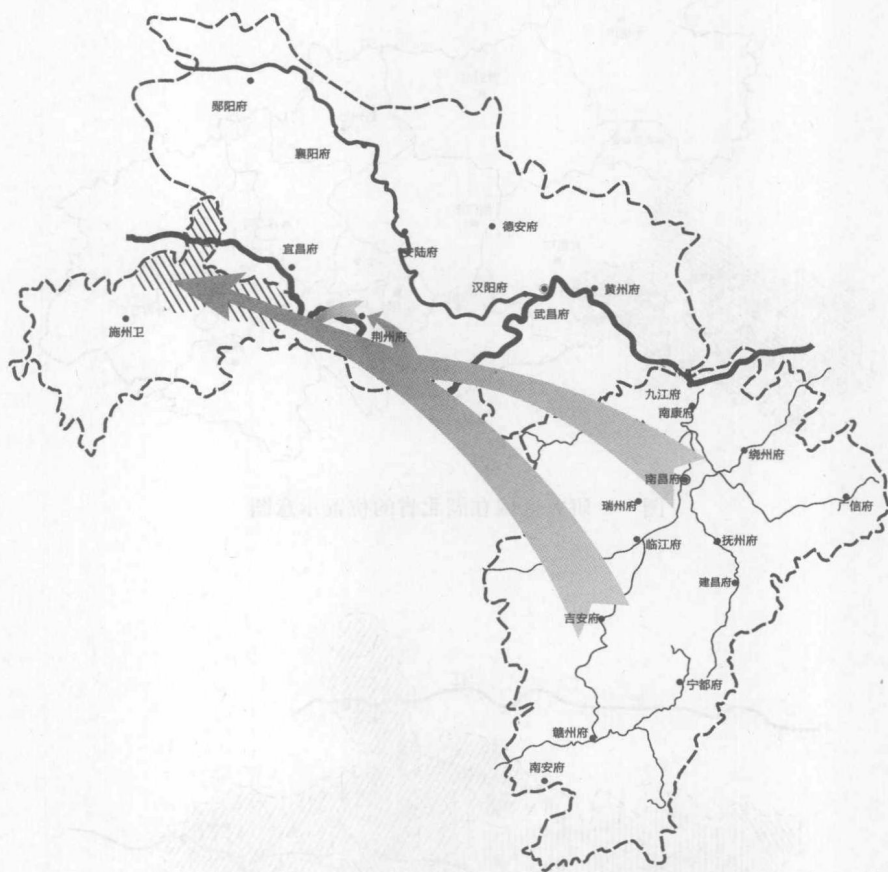
四是研究结论合理科学。移民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它们实现了多元文化的互动与整合，促进了中华民族认同意识形成。作者通过移民与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考察，认为现阶段在促进“多元”文化发展、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同时，要通过丰富中华民族“一体”文化的内涵和加强核心文化建设来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强化中华民族认同。

当然，全书值得肯定的地方，绝不限于上述几点，在此，就不一一阐述了。洪林生长于鄂西南山区，这片土地的滋养，培育了他不畏艰难，勇于进取的精神，他为人谦虚朴实，为学勤奋刻苦，这些品德是我十分看重的。现在这部著作即将出版，作为洪林的老师，我感到非常高兴，并乐于为此作序。总之，我认为这部著作具有很高的原创性，全书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观点，为中国民族史和移民史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是这些领域研究的新尝试。当然，中国民族史、移民史研究是一项较大的工程，尽管作者在多个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然而需要探讨和阐述的问题仍然很多，这不是一部著作所能完成的，但我相信本书的出版，必将对进一步推动中国民族史与移民史研究向着深度和广度不断开拓进取产生积极的作用，是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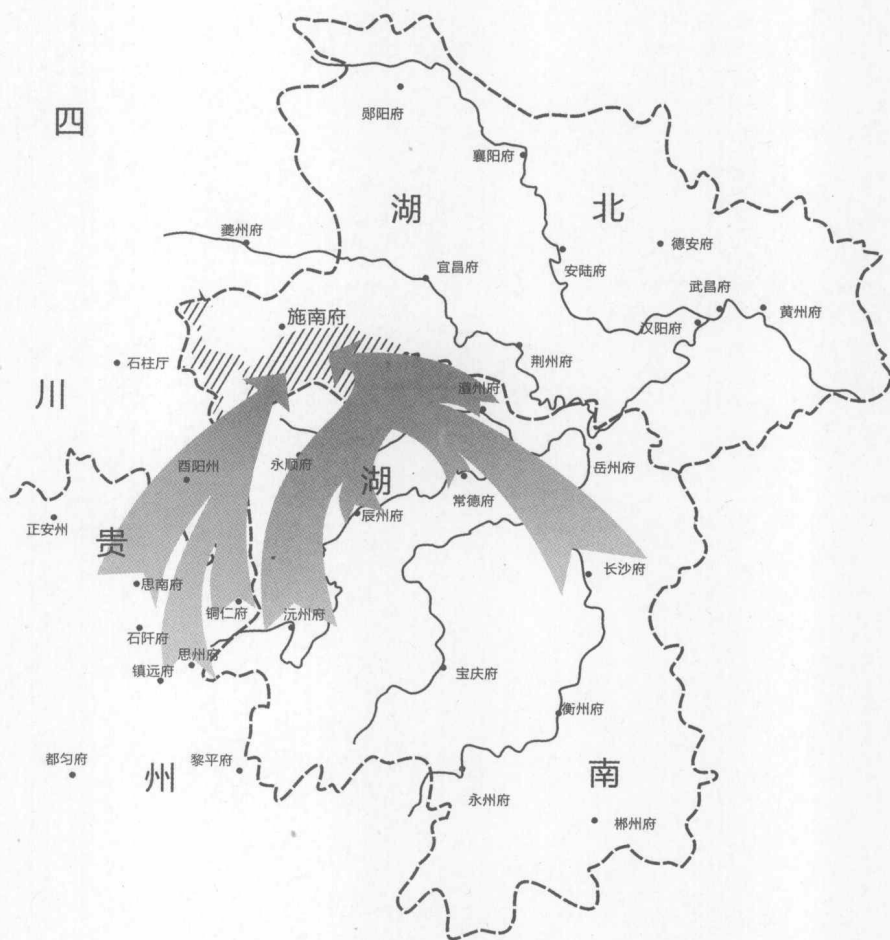
姚伟钧

2013年端午于华中师范大学





图三 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移民示意图



图四 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招垦移民示意图

内容摘要

本书运用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明清移民和乡村社会为研究对象,在文献梳理以及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明清移民和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并就移民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

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地处中国中西结合部,是土家族、苗族、侗族等多民族聚居区,从考古发掘来看,该区域很早以前就有古人类活动。早在先秦时期,该区域就有楚人、蜀人、三苗等族群迁徙活动,在羁縻时期,该区域有两次较大规模的移民,分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移民和宋代的移民。羁縻时期的移民多起源于军事活动和农业开发。这是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明清以前的移民历史背景。

明清时期,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有三次移民潮,一是从元末明初持续至乾隆时期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移民;二是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设置施州卫以及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设置大田军民千户所时迁入的卫所官兵,即卫所移民;三是改土归流之后的招垦移民。“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移民主要来自江西南昌府、吉安府和湖北荆州府,卫所移民主要是从长江中下游地区迁来的官兵和从重庆酉阳迁来的土官、土兵,总人数大约有3万人,招垦移民主要来自湖南的常德府、澧州、沅州府、辰州府、长沙府和贵州的铜仁府、思南府、思州府等地,迁来的人口总数大约为18.8万人。这些移民迁徙的原因既有迁出地的推力,也有迁入地的拉力。移民主要沿着与长江平行的三横和与长江垂直的四纵七条陆路和沿澧水、湓水,沅水、酉水,乌江、阿蓬江三条水系形成的陆路和水路,以及以鹤峰、来凤为起点直通湘西的陆路盐道迁徙。

明清移民中,卫所移民属于强制性移民,其他移民绝大多数是自发性

移民。强制性移民和自发性移民具有不同的社会融入方式,强制性移民经历了强行植入和自发融入两个阶段,自发性移民主要借助自身以及同乡移民的力量,首先生活在同乡村落中,家族势力发展起来之后分化为家族村落而融入乡村社会。国家权力在强制性移民的强行植入阶段,对乡村社会干预太多,给土著社会带来较大冲击,引起土著与移民之间的强烈对抗,到了明代后期,国家权力在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式微之后,移民与土著的关系得以缓和,进入自发融入阶段。这样的社会融入方式,使得卫所移民借助国家权力获得了很多优势资源,生活在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中心,即使在卫所体制解体之后,他们仍然保持这种中心地位。

明清移民引起了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巨大变迁。乡村社会变迁首先体现在生态环境变迁上,移民迁入之后积极进行生存环境建设,一些新的物种传入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并得到推广种植,取得了一定的建设成就,但是生态破坏也非常严重,天然动植物资源急剧减少,土地沙化和石漠化日趋严重,抗灾能力急速下降;其次体现在乡村经济变迁上,移民推动了乡村经济走向繁荣,乡村市场逐渐兴起,商品贸易更加活跃,生漆、桐油、苧麻、茶叶等大宗农产品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再次则体现在文化变迁上,受移民文化影响,土著的居处文化、服饰文化、民间信仰文化、人生礼仪文化、饮食文化等文化都发生了变迁,吸收了较多汉文化因子以及部分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的文化因子,移民的传统文化同时也受土著文化影响,发生了变迁;再其次体现在乡村社会秩序的冲突与整合上,清代中后期,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先后爆发了白莲教起义和反洋教斗争等社会冲突,在冲突过程中实现了移民与土著社会的深度整合;最后体现在土著家族的认同变迁上,在移民的影响下,土著家族重新建构了家族的历史记忆,形成移民认同。

移民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他们实现了多元文化的互动与整合,促进了中华民族认同意识形成。笔者通过移民与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考察,认为现阶段在促进“多元”文化发展、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同时,要通过丰富中华民族“一体”文化的内涵和加强核心文化建设来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强化中华民族认同。

Abstract

This paper, by adopting theories and methods from history,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and taking the migration and rural society changes that occurred among the minority people in Southwest Hubei during Ming Dynasty and Qing Dynasty as researching objects, researches thoroughly into the migration and rural society changes and relationship that occurred among minority people in the Southwest Hubei during Ming Dynasty and Qing Dynasty, as well as migration's effect in forming Chinese people diversity pattern, on the basis of documentation, classification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he living regions for minority people, mostly, Tujia, Miao and Dong minority people, in Southwest Hubei locate in the transition zone between Western China and Eastern China. Judged from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this region is one of the cradles for mankind. In the Pre-Qin period, there has been migration behavior for people of Chu, Shu and Sanmiao. During the feudal society period, there were two large scales migrations within this period, namely the migration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s well as the migration in Song Dynasty. The migrations during feudal society period were mostly caused by military activities 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is i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for the migration that occurred among the minority people in Southwest Hubei during Ming Dynasty and Qing Dynasty.

During Ming Dynasty and Qing Dynasty, there were three major migrations. Firstly, it was the Jiangxi-Hunan and Guangdong, Hunan and Guangdong-Sichuan migration. Secondly, it was the immigrated soldier du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Shizhou Wei in 1381, Hongwu 14th Year in Ming Dynas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Datian in 1390, Hongwu 23rd Year in Ming Dynasty.

Thirdly, it's the farming immigration after bureaucratization of native officers. In Jiangxi-Hunan and Guangdong, Hunan and Guangdong-Sichuan period, most immigrants came from Nanchang Jiangxi, Ji'an Nanchang, and Jinzhou Hubei, while the Weisuo immigrants, totally 30, 000 people, were officers and soldiers from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as well as Youyang, Sichuan. The farming immigrants were mainly people, totally 188, 000, from Changde, Lichou, Yuanzhou, Chengzhou and Changsha in Hunan province as well as Tongren, Sinan and Sizhou in Hubei provinc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se immigrants were the push from emigrating areas and the attraction from immigrating areas. They mainly travelled through seven land and water passages formed by Li River, Luo River, Yuan River, You River, Wujiang River and a Pengjiang River, all of which wer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to Yangtze River, and the salt delivery passage on land started from Hefeng and Laifeng and headed to Western Hunan province.

Among the migrations during Ming Dynasty and Qing Dynasty, except for Weisuo migration which was a forced migration, all were volunteer migrations. The forced migration and volunteer migration had different social integrations. The forced migration would have to experience forced integration and volunteer integration stages, while volunteer migration first tried to live in the new places with the support of their own strength and support from migrants of same origins. After their family power grew bigger, they would b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families and villages to integrate into local rural society. In forced migration required by national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would cause much interruption to rural society and impacts to local society, which would always result in fierce conflicts between local people and immigrant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when the government power became less influential in the rural society of minority people in Southwest Guizhou,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migrants and local people was eased and they entered into the stage of volunteer integration. Such kind of social integration has enabled the Weisuo immigrants to enjoy a large sum of advantage resources and live in the center of rural social power. Even after the collapse of Weisuo system, they still managed to keep the central position.

The immigrants during Ming Dynasty and Qing Dynasty have brought signif-

icant changes to the rural society of minority people regions in Southwest Hubei. Firstly, the social changes were proved by the biological changes. The immigrants actively promoted the biological building and some new kinds of crops began to be planted in the minority people regions in Southwest Hubei. Though they made some achievements of biological building, the biological environment was also significantly damaged, causing rapid drop of natural resources, serious desertification, stony desertification and significant drop of disaster resistance. Secondly, it's also indicated by the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immigrants pushed the local economic prosperity, enhanced rural market and motivated commodity trading. The trading of raw lacquer, tung oil, China grass and tea had become the main ways to improve peasants' income. Thirdly, it also resulted in cultural changes. Due to the influence from immigrated culture, the local living culture, costume culture, belief culture, etiquette culture and diet culture changed after absorbing most Han culture and some culture from minority people, such as Miao and Dong. Meanwhile, the culture of immigrants was also influenced by local culture. Fourthly, during the conflicts and integrations for rural social consequence in the middle and late Qing Dynasty, there were White Lotus Uprising and missionary-resisting social conflicts, which deepened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immigrants and local people. Finally, it's supported by local people's recognition changes. Influenced by immigrants, local people reconstructed the family history and formed migration recognition.

Migration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forming Chinese people's diversity pattern.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it has enhanced the sense of whole Chinese people. The author, through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n migration and rural society changes, suggests that we shall improve Chinese culture's integrity by enriching Chinese People's integrity culture's connotation, strengthening Chinese people culture's integrity and improving Chinese people's recognition while improving diversified cultural developments and protecting cultural diversity.

绪 论

一 选题意义

1. 理论意义

费孝通先生基于以单个少数民族为单位编写各民族的历史，不太符合中国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特点以及他认为自己“不是专攻历史学的人，但对过去以汉族为中心的观点写成的中国的历史一直有反感”^①的两点思考，于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作学术讲演时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他提出的这一理论包含三个主要论点，一是“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因为这些加在一起的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二是“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三是“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行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②费孝通先生提出这几个论点之后，没有进行详细论证，其理论本质是“一种结构论”，缺少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研究。虽然费孝通先生后来主编了《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③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两本论文集，但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过程的问题仍然没有圆满解决。徐杰舜先生虽

①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② 同上书，第13页。

③ 费孝通：《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